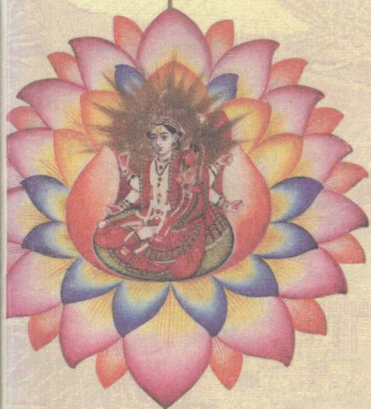




魔种

Magic Seeds

〔英〕奈保尔 著 吴其尧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奈保尔作品
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

魔种

Magic Seeds

[英] 奈保尔 著 吴其尧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种/(英)奈保尔(Naipaul, V. S.)著;吴其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

书名原文:Magic Seeds

ISBN 978-7-5327-4386-5

(奈保尔文集)

I. 魔... II. ①奈... ②吴...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46670号

V. S. NAIPAUL

MAGIC SEEDS

A NOVEL by V. S. NAIPAUL

Copyright: © 2004 BY V. S. NAIPAU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ILLON AITKEN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7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6-655号

魔种 [英]V. S. 奈保尔/著 吴其尧/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60,000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册

ISBN 978-7-5327-4386-5/I·2478

定价:20.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021-56135113

后来——在柚树林第一次宿营，第一次晚上站岗的时候，他有好几次都忍不住只想哭，终于天亮换班了，他听到远处孔雀奇异的鸣声，那是它清晨在树林水池里喝过第一口水后的鸣叫，沙哑得有些撕心裂肺，仿佛它本想讲述一个新生的世界，然而在漫长的不眠之夜过后，听上去却像在讲述失落的一切，讲述着人、鸟、树林和世界；然后，那段营地时光成了浪漫的回忆，在打游击的那几年里，在他麻木地辗转于树林、村庄、小镇的时候，在他以各种身份毫无目的地游历四方，甚至常常忘了自己为什么要改变身份的时候，在他自觉智力衰退、人格断裂的时候；然后，是监狱生活，那里神圣的秩序、固定的作息时
间、各项保护措施，以及监狱所提供的自新机会——后来，他终于得以一步一步地从他曾以为的现实世界，走向之后的所有那些非现实境地：从一个封闭的心灵的房间走向另一个心灵的房间。

卖玫瑰花的人

这种生活很多年前就已开始，在柏林。另一个世界。他借住在妹妹萨洛姬妮那里。这是他离开非洲后的全新生活，再不必担惊受怕，几乎像个观光客似的，无忧无虑，心满意足。当然，这种新生活早晚会的结束；有一天萨洛姬妮对他说：“你已经住了六个月了。我没法儿再为你申请签证延期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恐怕不能再待这儿了。现实就是这样。你没法儿跟它对着干。你得考虑换环境了。有没有想过去哪儿？想过做些什么吗？”

威利说：“我知道签证的事。我一直在考虑呢。”

萨洛姬妮说：“我知道你所谓的‘考虑’是怎么回事。无非是置之不理罢了。”

威利说：“我不知道能做点什么。我也不知道能去哪儿。”

“你从来就没觉得自己能做点什么。你也从来不明白男人得为自己打天下。”

“你说得对。”

“别这样和我说话。压迫阶级才这么想。他们只要自己坐稳，就以为天下继续太平了。”

威利说：“你这样牵强附会，帮不了我什么忙。你很清楚我的意思。我觉得以前总受命运的播弄。在印度那会儿，我又能做什么呢？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在英国那会儿，我又能做什么呢？在非洲又能做什么呢？”

“你在非洲待了十八年。你妻子真够可怜的。她还以为自己跟了个男人呢。她找我谈谈就好了。”

威利说：“我从来就是个局外人，现在也一样。这会儿在柏林，我又能做什么呢？”

“你是局外人，就因为你自已想做局外人。你总是喜欢躲躲藏藏的。你这是殖民变态心理，种族变态心理。是从爸爸那儿遗传来的。你在非洲待了十八年。非洲那场伟大的游击战争，难道你不知道？”

“那是很遥远的事情了。自始至终就是场秘密战争。”

“那是场荣耀的战争。至少开头是的。回想起来，总能令人热泪盈眶。一个贫穷无助的民族，从一开始就在自己的土地上沦为奴隶。看看你做了些什么？你找过他们吗？你帮过他们吗？你为他们做过什么事吗？对于那些胸怀大志的人来说，这可真算得上是件大事业了。可是你呢？你就躲在自己的房子里，陪着你那位一半白人

血统的娇妻,用枕头蒙住耳朵,一心只想着千万别有什么黑人自由战士挺着枪踩着皮靴深更半夜闯进来吓着你。”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萨洛姬妮。我内心深处总是站在非洲人一边的,但是并没有什么仗需要我去打。”

“要是人人都这么说,那无论哪里都不可能发生革命了。我们大家都有仗要打。”

当时他们正坐在克尼塞伯克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冬天,这家咖啡馆里总是氤氲着暖意,侍者都是彬彬有礼的大学生,完全是威利喜欢的氛围。而现在正是夏末,咖啡馆里空气凝滞得令人感到压抑,那里的一整套仪式是司空见惯的了,仿佛在提醒威利——无论萨洛姬妮怎么说——时间白白流过,使他想起他们在教会学校里熟记的那首神秘的十四行诗。“而这消逝的时光就是夏日……”

一个年轻的泰米尔男人走进来卖长枝红玫瑰。萨洛姬妮轻轻打了个手势,低下头看自己的包。泰米尔人走上前,递过一枝玫瑰,但始终没有直视他们的眼睛。他无意和他们攀亲。这个卖玫瑰花的人,沉着自持,满肚子主见。威利没有去看那人的脸,只是盯着他的棕色裤子(远方的裁缝做的)和毛茸茸的手腕上的大号镀金手表和手镯(也许不是真金的),然后发现,这个卖玫瑰的人在他自己的环境里也许不过是个微不足道、不为人所见的人。而在这里,在一个他或许知之甚少(和威利一样)的环境中,在一个他或许不知如何理解的环境中,他仿佛是被剥离了自身。他变成了另一个人。

几个星期前的某一天,威利独自出门,也见过一个这样的人。他在一家印度南方风味餐馆外面停了一会儿,餐馆里没有顾客,只有几

只苍蝇在玻璃橱窗上爬来爬去，下面摆着些盆栽植物和煎饼的展品，还有几个笨手笨脚的小个子侍者（也许不是侍者，而是其他什么人，也许是非法入境的电工或者会计）躲在里面暗处，可怜巴巴的灯光映射出某些人所谓的东方式装潢。这时候一个印度人，也可能是泰米尔人，走到威利跟前。松松垮垮的一副身材，倒也算不得肥胖，线条柔和的宽脸膛，头戴灰色的平顶帽，镶嵌着蓝色细线编织出的大方格图案，有点像袋鼠牌的高尔夫球帽，威利曾在老早的企鹅版书籍的封底广告上见过：也许眼前这个人就是在模仿那些老广告里的做派。

此人就和威利聊起了那场即将打响的伟大的游击战。威利也显得兴致勃勃，甚至很亲切。他喜欢那张线条柔和的笑脸。他迷上了那平顶帽。他喜欢这样的窃窃私语，议论一个令人震惊的世界。可是，当那个人转而说起他急需用钱，而且语气越来越急迫，威利开始担心了，接着害怕了，然后他就想从餐馆橱窗前逃走，逃离沾在橱窗上的那些昏昏欲睡的苍蝇。而那个人仍然满脸微笑，柔软的唇间却蹦出长长一句尖刻的泰米尔语毒咒，威利似懂非懂，最后那人的微笑消失了，蓝格子高尔夫球帽下的脸扭曲成一种可怕的仇恨。

那突如其来的泰米尔语，那包含着此人所有信仰的古老诅咒，那瞬时迸发的刀子般深刻的仇恨，所有这些令威利坐立不安。威利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萨洛姬妮。从小时候起，他就习惯于把什么事都藏在自己心底，在家里、在学校里，都是如此；逗留伦敦的那些年，这个习惯逐渐根深蒂固，而住在非洲的十八年间，这更是成了他性格中的重要部分，因为他总是有那么多显而易见的事情要向自己隐瞒。别人告诉他那些他早就熟知的事情，他也总让别人说下去，那不是别有

用心,也不是刻意为之,而只是不想冒犯别人,只是想事情平平稳稳地过去。

现在,萨洛姬妮把玫瑰放在她的碟子旁边。她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那个卖玫瑰花的人,看着他在桌子之间走来走去。他走出去之后,她对威利说:“我不知道你怎么看那个人。但是他活得远远比你有意义。”

威利说:“没错。”

“别惹我。你这些个聪明话对付外人还行。对付我可没用。你知道为什么那个人活得比你有意义吗?因为他找到了他要打的仗。他可以逃避。他可以说自己还有其他事得做。他可以说他得谋生。他可以说:‘我这是在柏林。我好不容易才到了这里。办了那么些假文件、假签证,还得东躲西藏。现在总算都了结了。我离开了家,放弃了原来的一切。我得摆出样子来融入这个陌生的阔地方。我要看电视,要知道些外国节目,要开始当它们是我自己的节目。我要去卡德韦百货公司,去下馆子。我要学会喝威士忌和葡萄酒,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数自己的钱、开自己的车,会感觉自己和广告里的那些人一样。我会发现其实改变一切一点都不难,而且我会觉得这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的方式。’他可以有这些虚伪甚至无耻的想法。但是他明白他有仗要打。你注意到没有?他一直没有正眼看我们。他当然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他知道我们是他同胞,但是他瞧不起我们。他就是把我们当作那种装腔作势的人了。”

威利说:“说不定是他不好意思,他是泰米尔人,在向这里的人卖玫瑰花,还被我们看见了。”

“他看上去可不像是不好意思。他看上去是那种有抱负的人，看上去与众不同。有件事情你在非洲可能就注意到了，要是你已经学会了观察。这个人在这儿卖玫瑰，可这些玫瑰会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变成枪炮。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我曾经去过他们的几处营地。我和沃尔夫正在拍摄一部讲他们的电影。我们很快就会听到更多有关他们的消息。这世上再也没有纪律严明的游击部队了。他们真是残忍得很，丑陋得很。而你要是更了解你祖国的历史，你就能明白那实在是不可思议。”

另一天，在动物园里，到处是那些无所事事的笼中兽的恶臭，她说：“我得和你谈谈历史。要不然你会以为我疯了，就像我们舅公那样。你还有和你一样的那些人，所知道的有关你们自己的历史都来自一本十九世纪的英国教科书，作者是在印度任督学的一位英国人罗帕·莱斯布里奇。你听说过这回事么？这是印度第一本大型历史教科书，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那时印度反英大暴动^①刚过去二十来年，这本书的立场当然是帝国主义的，还为了赚钱。不过，它也体现出某种英国式的知识观念，算是本好书。在此之前的印度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一本书，没有过这样的教育体制，也没有过这样的历史学科训练。这本书出了好多版本，它教给我们的许多看待自己的观念，至今还保留着。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印度存在着奴隶阶层，有些人生来为奴，还有军人阶层。军人阶层是属

① the Munity, 1857—1858 年印度本地士兵反对英国殖民政策的暴动。

于上流的,奴隶阶层则不是。你我就有一半是属于奴隶阶层的。我敢说你一定知道这一点。我敢说你还部分接受了。所以你才总是这样过日子。而那些在柏林卖玫瑰花的泰米尔人则是完完全全的奴隶阶层。这种观念通过各种渠道灌输给了他们。而实际上,英国人那套印度分成奴隶阶层和军人阶层的观念,整个儿就是错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北部的军队,招募的都是种姓等级高的印度教士兵。这支军队把英帝国的边界几乎推到了阿富汗。但是,1857年反英大暴动之后,这支军队就落魄了。接下来的军事行动轮不到他们了。于是这些曾经受帝国垂青的勇士们就在英国的官方宣传中成了奴隶阶层,而大暴动之前被他们征服的边疆居民则成了军人阶层。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手段。这就是阶下囚的命运。因为我们印度人不懂得历史,所以我们很快就忘记了过去,却一味把人家那套话信以为真。而南部的泰米尔人,则在英国的新体制下沦为泥淖。他们肤色黑,又不擅长作战,只能充当劳力。他们被运到马来亚、锡兰和其他地方,卖给当地的种植园当农奴。现在柏林那些靠卖玫瑰花筹钱买枪炮的泰米尔人,已经扔掉了历史和政治宣传的重负。他们已经使自己成了真正的军人,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做到了这一点。威利,你得尊重他们。”

动物园里尽是那些郁郁寡欢的动物所发出的臭味,而威利就这么茫然地听着,一言不发。萨洛姬妮是他的妹妹。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能这样了解他。她知道他的每一个幻想的每一个枝节,知道他在英国和非洲期间的点点滴滴,尽管在过去二十年间他们只见过一次。他甚至觉得,即使没有语言交流,她也已经有各种办法,了解他

性生活中的许多细节。什么都瞒不过她；甚至在她最革命、最平常、最信口开河的时候，就算她是在重复她那些老生常谈，却依然能够不时用几个绝妙的词儿，唤醒他们共同度过的那些特殊时光，触动他内心深处某些他自己宁可遗忘的角落。

她滔滔不绝的时候，他一言不发，但记住了她所说的每一句。在柏林他渐渐留意到她的一些事，以前他可从来没有在意过。尽管她的话题从来没有离开过不公、暴行和革命需要，虽然她开口必大谈五大洲的流血活报剧，但她却出人意料地沉静。她早年那种急躁易怒和咄咄逼人的架势已经不复存在。在老家的静修坛上她被不断地消磨着，除了虔诚和顺从，她一无所求；在她离家之后的那许多年来，这种可怕的静修生活——往往给头脑简单、穷困潦倒的人们提供些水月镜花般的万能灵药，她至今仍然触手可及，她仍然可能回归其中，一旦沃尔夫遇到了什么麻烦。

她如今再也没有那种焦虑了。正如她已经学会了如何在寒冷的季节里穿衣打扮，如何使自己风度翩翩（羊毛衫、羊毛袜配纱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旅行、读书、革命政治，和那位大度的摄影师之间随意而对等的生活，这一切使她处于完整的知性体系中。现在没有什么会令她吃惊或使她受伤了。她的世界观能够包容一切：危地马拉的政治谋杀、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印度的种姓骚乱，甚至柏林酒商的顺手牵羊——不知道是他开店的习惯还是原则，这位酒商送酒上门时，总有两三瓶不是搞错就是短少，酒价也会莫名其妙地调整。

她就会说：“这就是西柏林。他们在空中走廊的尽头，什么都得靠救济来维持。所以他们有精力搞点顺手牵羊。这就是西方的没

落。他们会意识到这一点的。”

而萨洛姬妮自己呢,通过她那位摄影师帮忙,靠某个联邦德国政府部门的救济金生活。所以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过得很安逸。

每当新送来一箱葡萄酒或者啤酒,她就会说:“我们来看看那个无赖这次耍了什么花招。”

他记忆中的二十多年前老家的那个萨洛姬妮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而此刻,身在柏林,正是她这种沉静以及优雅的谈吐,使他觉得越来越多地产生共鸣。他惊奇地看着自己的妹妹。这竟然是他妹妹,他甚至有些激动了。与她相处了六个月——他们成年之后从来没有相处过这么久——他觉得世界开始改变了。正如他觉得她能够深入他所有的情绪,甚至性需求,他也开始深入她的观察方式。她所说的一切都包含着某种逻辑和秩序。

他现在所感觉到的一切,其实他向来就心知肚明,但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那就是,他发现萨洛姬妮说到的是两个世界。一个世界秩序井然,按部就班,这里的战争已经结束。这个世界没有战争,没有真正的危险,人已经被简化了。他们看看电视,找到了自己的生活圈子;他们的饮食都很安全;他们能掌握自己的钱。而在另一个世界里,人就疯了似的。他们拼命想挤进那个简单有序的世界里。但是当他们在外面的时候,一百颗爱国的忠心、古老历史的残余将他们牢牢牵制住;一百场零零碎碎的战事激起了他们的仇恨,耗尽了他们的经历。在西柏林,一派自由而忙碌的气氛,一切都显得那么闲适。可不远之外就是一道人为的分界线,在分界线的那一边,是压制和束缚,是另一类人。高楼大厦的废墟场上,荒草滋生,偶尔还有些杂树;

随处可见弹片弹壳深深嵌入了岩石和水泥中。

这两个世界并存着。视而不见是愚蠢的。现在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属于哪个世界。二十多年前在老家的时候,想逃避这个事实,对他来说似乎还是很自然的。但现在,所有那些随此而生的念头,在他看来简直就是可耻的了。他在伦敦的部分生活;他在非洲的全部生活——当时他总是处于半隐居状态,衡量自己成功与否的标准就是,他在所属的那个一半葡萄牙血统的二等阶层中并不十分显眼,勉强“过得去”;所有这些现在看来都是可耻的了。

一天,萨洛妮妮带回家一份《先驱论坛报》。报纸折成一个方形,正好露出一篇报道。她把报纸递给他,说:“这篇讲的是你以前住过的地方。”

他说:“拜托你不用给我看。我告诉过你了。”

“你必须得睁开眼看看了。”

他接过报纸,心底里唤着妻子的名字:“安娜,原谅我。”他根本没去读那篇报道。他不需要去读。他的心就活在那里。那场不折不扣的血腥内战。没有军队的调遣转移;只有跨越边界的突袭、烧杀、恐吓,然后撤返。报上有一张照片,一幢幢白色混凝土楼房,屋顶已被焚毁,几处烟熏痕迹勾勒出空空的窗洞:非洲那些简易的乡间民居已经是一派瓦砾。他回想起那些熟悉的道路、蓝色的石堆、海边的小镇。他们自欺欺人地以为天下太平;但是内心深处,他们知道战争正在迫近,总有一天那些道路将会消失。

叛乱刚起时的某一个星期日,他们边吃午饭边做了这个游戏。他们说,假设我们与世隔绝。想象一下没有外界的介入,生活会变得

怎么样。首先,当然是汽车没有了。接下来,医药没有了。然后,布没有了。电灯没有了。就这样,他们一边吃午饭——身穿军装的男孩子们就在旁边,四轮车就停在院子的沙地上,一边玩这个游戏,想象着物质匮乏带来的一切。然后,一切就都发生了。

现在,威利身在柏林,为自己在非洲的所作所为而深感羞耻。他想:“我不能再躲下去了。萨洛姬妮说得没错。”

然而,他并没有把这想法告诉她——他的老习惯。

一天下午,他们在某条主要商业街的行道树下散步。威利在帕特里克·海尔曼商店前停下脚步,观赏起橱窗里的阿玛尼男装。二十年前,他对服装一窍不通,也不懂欣赏面料和裁剪;如今大不相同了。

萨洛姬妮说:“你认为谁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

威利说:“阿玛尼就很伟大,不过我猜这不是你要的答案。你是要我说其他人物?”

“说说看。”

“罗纳德·里根。”

“我就猜到你会说他。”

威利说:“我说他就是为了逗你。”

“不对,不对。我知道你真的是这么想。但我不是问最有权势的人物。我是问最重要的人物。你觉得坎达帕里·西塔拉米阿怎么样?”

“他是最重要的人?”

“重要的人不一定很有权势。列宁在1915、1916年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权势。我所理解的重要的人,就是会改变历史进程的人。一百年之后,当二十世纪革命史可以盖棺定论,形形色色的民族中心主义消失殆尽的时候,坎达帕里将会和列宁和毛泽东相提并论。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你甚至都没有听说过他。我知道。”

“他参加了泰米尔运动?”

“他不是泰米尔人。但是坎达帕里和泰米尔运动属于这个世界的同一个变革。如果我能说服你相信这个变革,那你就脱胎换骨了。”

威利说:“我对法国历史一无所知,只听说过冲击巴士底狱。但我还知道点拿破仑的事。如果你肯告诉我,我相信我一定能理解坎达帕里。”

“我怀疑。坎达帕里作为革命家的极端重要性在于,他破除了林彪路线。”

威利说:“你的思路太快了,我不明白。”

“你恼火了。你在掩饰。你肯定知道林彪。全世界都知道林彪。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做清算阶级敌人。一开始,这真是又简单,又激动人心,看起来也很先进。我们印度人也喜欢这个观点,因为它是从中国传来的,我们以为,它能使我们赶上中国。但实际上,这种观点把革命给毁了。林彪路线把革命变成了中产阶级的舞台。城里那些好出风头的中产阶级年轻人,穿戴成农民的样子,脸上手上染了胡桃汁,跑到街上聚众滋事,自以为所谓革命就是除掉警察。警察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抹平了。参加这种运动的人总是低估警察的力量,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回事。我猜因为他们太自以为是了。”

“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在非洲，目睹了一场真正的战争。后来，这里的人说，我们失去了整整一代革命者，那么年轻，那么优秀，无人可以取代。我自己也这么认为，甚至为此难过了好几个月。印度的知识阶层，进步总是那么缓慢。我不说你也知道。没有土地的劳动力迁往城镇，他们的儿子可能就成了小职员。小职员的儿子也许就能接受高等教育，他的儿子就可能成为医生或者科学家。所以我们很悲痛。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创造出一批革命人才，而警察却在顷刻间摧毁了五十年甚至六十年的斗争才积聚起来的才智结晶。想起来就令人胆寒。

“我来告诉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时候，暴风雨会将一些优美的老树连根拔起。你看到了只有手足无措。第一反应是愤怒。于是你想找到那个敌人。然后你马上就会意识到，虽然愤怒是一种宣泄，却根本无济于事，你会意识到你的愤怒根本没有对象。你必须另想办法弥补你的遗憾。就在我处于这样一种空虚、抑郁的情绪中时，我听说了坎达帕里的事迹。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宣告了一种全新的革命。他说，那些所谓‘失去了整整一代优秀革命者’的高谈阔论全是矫情的无稽之谈。他们才不是特别优秀，才不是饱读诗书，才不是什么革命者。如果他们的是的话，他们就不可能陷入愚蠢的林彪路线。坎达帕里说，不对，我们不过是失去了整整一代读书不多、自以为是的蠢货，真是走运。

“我听到这样的说法，可真是觉得受了伤害。我和沃尔夫都和革命者一起做了许多事。我们认识他们中的不少人。但是，坎达帕里的话虽然刻薄，却使我开始思考一些事情，我之前曾经注意过，却